第18卷 第1期　　昆虫学报　　Vol. 18, No. 1
1975年2月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February, 1975

我国治蝗史上的路线斗争

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大批判组

蝗虫，这个农业上的大害虫，给我国劳动人民不知带来过多少苦难。仅据史籍记载，从周末春秋时代起，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千多年中，蝗灾就发生八百多次。由于蝗灾的发生和水灾、旱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所以它们此起彼伏，交错发生，成为我国历史上威胁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最严重的三大自然灾害。

蝗灾的发生固然有它复杂的自然因素，但最根本的则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路线所决定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蝗灾每隔一、二年发生一次，特大的蝗灾就有三次。特别严重的是在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炸塌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决口，使千百万亩良田变为荒滩，成为适合于蝗虫孳生的黄泛区，致使四十年代初几乎连年发生蝗灾；蝗虫在十多个省、市，一百三、四十个县迁飞为害，千百万劳动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这是蒋介石对广大劳动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我国古代，也是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日益反动腐败而蝗灾日趋严重的。这是历史所证明的不可辩驳的事实。

对蝗灾是进行积极斗争，还是听天由命任其发展？这是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在治蝗问题上的矛盾焦点。法家主张革新，重视"耕""战"，他们鼓励人民群众的治蝗斗争，减轻了蝗灾带给人民的痛苦，在历史上对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只知道如何去欺骗和压榨劳动人民，对蝗灾不是不闻不问，便是祈天求神，因而使蝗灾更为猖獗。

当前，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治蝗史上的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加深认识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加速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民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国的治蝗史上，也完全说明了毛主席这一论断的英明正确。在我国古代，由于蝗灾严重危害人民的生活，所以劳动人民对蝗虫曾进行了频繁而积极的长期斗争，取得了不少成绩。在与蝗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明应用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灭蝗方法。很多有法家思想的人，把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整理总结，写成书册，对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早在三千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创造了以火灭虫的办法。《诗·小雅·大田》中"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毋害我田穉……秉畀炎火"[注1]的歌谣就是明证。以开沟陷杀成虫和跳蝻的方法，可能在两千年前也已应用；东汉王充在《论衡·顺鼓篇》中就曾写到："吏卒部民，堑道作埳，榜驱内于堑埳，杷蝗积聚以千斛数。"到了唐朝，姚崇把焚烧和沟陷的方法

[注1]　根据《尔雅》中的解释：食苗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所以螟螣蟊贼都是侵食庄稼的害虫。这几句的意思是：消灭食害庄稼各部分的害虫，使它们不为害田里的幼苗……还是把它们放在烈火中烧掉罢。

结合起来，用于防治蝗虫，很有成效。在宋朝，开始采用掘卵灭蝗的方法。在明、清两代，已知道结合飞蝗活动的习性来进行防治蝗虫。如根据蝗蝻和成虫都喜欢顺风移动，当风微弱时亦有逆风的，而且“性喜迎人”，成虫“早晨沾露不飞，日午交媾不飞，日暮群聚不飞”，“天气下雨不能高飞”，及“蝗性向火……”等活动习性，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捕打方法。在《捕蝗要诀》[注2] 一书中，采用绘图及扼要而容易记诵的文字说明的方式，把各种治蝗方法，如“布围式”、“鱼箔式”、“合网式”、“抄袋式”、“围捕式”等汇辑起来，使易于推行。明朝末叶的徐光启总结了群众的治蝗经验，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治蝗知识。在他撰写的《农政全书》中，把蝗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叙述，提出了防、除并重的即“先事修备，既事修救”的办法，并认识到在防治蝗虫中除了“必借国家之功令，必须百郡邑之协心”外，还必须发动群众，“赖千万人之同力”。我国劳动人民注意到蝗虫的取食习性，《晋书》中记载蝗虫“不食三豆及麻”，元朝王祯在《农书》中也写到蝗虫“独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等等。根据蝗虫的这种取食习性，种植蝗虫不喜食的农作物来防治蝗虫，可取得一定的成效，这在元朝以后还有人经常提及。猪、鸭吃蝗虫也为人民所注意，从而提出过：“蝻未能飞时，鸭能食之，如置鸭数百于田中，顷刻可尽”的用鸭除蝗的生物防除法。

我国历史上的蝗灾发生最多的地方，是在冀、鲁、豫等省的旱涝发生无常的地方，徐光启对此曾作过概括性的描述。他已认识到“涝溢无常”的“涸泽”是蝗虫的孳生地，提出了“欲治蝗，图之此其地矣”的看法。同时，他还注意到荒地和蝗虫孳生的关系，并提出改旱田为水田的主张。

在我国治蝗史上，大规模的人工捕蝗，最早大概是在西汉平帝刘衎（音 kǎn）统治时期的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当时郡国大旱，生蝗，青州（在今山东境内）尤甚，官方派人捕蝗，并“以石斗受钱”，即根据捕蝗数的多少给以报酬。这是第一次实行奖励捕蝗的办法。公元 1182 年，南宋统治者孝宗赵昚（音 shèn，古慎字）在浙西和淮北发生蝗灾时，下令捕蝗，并制订了详细而严格的法规。这是我国第一道治虫法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治虫法规了。

由上述事例不难看出，我国古代的灭蝗技术是很先进的，很多方法的使用和对原理的认识要比国外早得多。这些史实，难道对那些言必称希腊的学者还没有教育意义吗？只要回顾这些史实，对我们破除迷信、批判洋奴哲学，树立雄心壮志，为尽快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必有促进作用。

在治蝗上，这些知识的获得和技术的发展是怎样得来的呢？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作了清楚的说明：“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老农的这些观察结果，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闻之老农言”，这就是徐光启之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能对蝗虫的生活习性和治蝗方法提出正确看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所在。

法家在社会斗争的实践中，能向劳动人民学习，这就使他们能够具有朴素的唯物史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和法家相反，儒家敌视革新，轻视生产，鄙视劳动人民。在儒家的著作《礼记》中就曾写到，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韩愈这个儒家的代表人

[注2] 此书作者佚名，钱炘和曾为之作序。

物也叫嚣说："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儒家对劳动人民、对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贡献的人是多么的敌视和仇恨啊！这些人物怎么还会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起促进作用呢？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颠倒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做的是怎样才能扼杀人民的才能、湮没人民的创造发明的罪恶勾当。在他们看来，发展生产有罪，有创造发明的人该杀；他们妄图阻碍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几个小丑，怎能阻止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呢？

二、在治蝗问题上"制天命"和"畏天命"的斗争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治蝗问题上，儒法两家推行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儒家代表了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和政治势力，推行了一条"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对蝗灾束手无策；而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主张革新，坚持前进，对蝗灾主张采取积极防治的措施，在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蝗灾发生时，儒家所做的只能是编造一些欺骗人民的邪说。他们极力鼓吹"畏天命"的反动思想，把人间富贵，吉凶福祸都说成是"天命"决定的，并把自然现象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宣扬"天人感应"，以此来欺骗人民，达到维护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孔丘所编的《春秋》一书中，最早有"桓公五年（公元前 707 年）螽"的记载，在该书中还记载了其他年代所发生的蝗灾八、九处。孔丘这个十分鄙视农业生产的家伙为什么要在他的所谓"寓褒贬，别善恶"的著作中记载蝗灾呢？这绝不是孔丘关心农业生产的表现，而恰好是他鼓吹反动思想"天命论"的罪证。《隋书·五行志》中说："《春秋》以灾祥验行事。"这就清楚地说明孔丘之所以在《春秋》中记载蝗灾，是因为他认为蝗灾的发生是和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一样，也是"天"对统治者有无"德行"的一种表态。他自己也曾说："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注 3] 孔丘的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为以后儒家的反动的神学目的论打下了基础。在孔丘之后，儒家把蝗灾主要记载在帝王的本纪中和志的五行部分。本纪是最高统治者的历史，记于此，是为了"谴告人君"，要统治者检查为政失德之处。在儒家看来，这是能永远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重要方法。记于五行志，即表明蝗灾是一种神秘现象，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有密切联系，所谓"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违则天地见异。"[注 4] 他们就这样把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归结为"天意"。在《左传》中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发生了蝗虫；汉儒刘向说成是因为春天采用田赋，冬天降灾而生蝗。又鲁宣公十五年冬发生蝗蝻；汉儒董仲舒和刘歆等说成是宣公时"初税亩"，推翻了井田制而致。[注 5] 他们把蝗灾的发生故意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无非是用以攻击当时鲁国新兴的封建制度。

[注 3]　这是孔老二对于灾害的唯心主义解释。意即老天爷为了教训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使自然灾害随着他有无"德行"而相应发生。语见《后汉书·五行志》注，引《魏志》中太史令高堂隆对魏明帝答话。

[注 4]　七曜是指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原素，或与五常(仁、义、礼、智、信)同义；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此句意为当统治者的行为有差错时天地中便会出现灾异。语见《隋书》卷二十二，志十七，五行上。

[注 5]　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法家的一些代表人物，针对儒家的那些欺人说教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早在战国末叶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荀况，在他的《天论》篇中批判了孔孟的"天人感应"观点，他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自然界的所谓灾异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没有联系。东汉的王充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桓谭、张衡等都反对当时儒家所盛行的"图谶"思想，批判了把自然灾异看作"天意"。王充在他的《论衡·感虚篇》中就批判了当时关于蝗虫不侵害有"德"的州县官吏所管辖的地域的迷信说法。

儒法两家不仅对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在观点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且在对蝗灾是治还是不治，用何种方法来消除蝗灾，也存在着完全不同作法。由于儒家把蝗灾等自然灾害看成是天意，所以他们对蝗灾就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消灭措施。他们所主张的只是让封建统治者下诏罪已。东汉永兴二年(公元 154 年)京师发生了蝗灾，并有日蚀出现，于是桓帝刘志便下诏称："朝政失中，……蝗螽孳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这样做的结果，灾害半点也没有减轻，而深受苦难的仍是劳动人民。儒家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而关心的只是如何推行他们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反动说教，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搞出了一套求神祈祷、求天息灾等骗人把戏。例如在古代每逢蝗虫严重发生时，便要祭神。在所祭的神中有关羽和"刘猛将军"，关羽与治蝗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刘猛将军"名承忠，是元代末年的一个军官，在江淮一带发生蝗灾时，他曾督兵逐捕，很有成效。在他死后，便有人给他立祠祭祀，把他作为偶像，以此来欺骗和愚弄人民。解放前在河南省浚县白寺坡、河北省芦台、山东省兖州等地都还遗有蝗神庙。除此之外，还搞了所谓"八蜡（音 zhà）之祭"，即每年最后一个月当庄稼收割完毕之后，要祭八个神，谓之"八蜡"，其中第八个就是昆虫，包括螟螽之类，祈求它们不再为害。儒家人物之所以这样搞，是有他们的思想根源的，他们曾把蝗虫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例如在儒家代表人物陆佃的《埤雅》一书中，就曾说："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烛厥理也。[注 6] 或曰：蝗即鱼卵所化，列子曰：鱼卵之为虫，盖谓是也。俗云：春鱼遗子如粟，埋于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则皆化而为鱼；如遇旱干水缩，不及故岸，则其子久阁为日所暴，乃生飞蝗。"由于早已就有的唯心的"化生说"和他们这种说法的流传，很多人上当受骗，把蝗虫认为是神虫，把飞蝗认为是鱼卵所化的了。蝗虫既然是神虫，当蝗虫大发生时，当然就不能扑灭，而只能面对着蝗虫的来临叩头作揖，祈求神虫嘴下留情。但蝗虫却毫不买账，在它们所到之处，青绿的庄稼便食之殆尽。儒家的所作所为，使劳动人民只能在蝗灾发生之后，逃荒要饭，离乡背井；而剥削阶级却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旧社会残酷剥削和蝗灾等自然灾害之后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也就是儒家在他们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在治蝗问题上所持"天命论"立场而给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恶果。

法家由于比较重视群众的生产实践，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所以在治蝗问题上，采取了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作法。他们总结了劳动人民的治蝗经验和治蝗方法，著书立说，赞同、支持劳动人民对蝗虫进行斗争。由于他们具有"制天命"思想，所以在治蝗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 6]　意义不明的意思。

法家主张治蝗，这必然要引起儒家的反对。唐朝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山东发生严重蝗灾。当时有法家思想的宰相姚崇看到受迷信思想影响的群众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着食苗的蝗虫不敢扑杀，便向玄宗李隆基奏请派官吏负责捕杀蝗虫的工作。李隆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为蝗灾是由“不德”造成的，是天意，不敢派人捕蝗。当时的汴州刺史倪若水和黄门监卢怀慎对捕蝗也都极力反对。后经姚崇力争，陈述了利害关系，说服了李隆基，排除了儒家的干扰，使治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汴州就烧埋了蝗虫十四万石。据说这年各地向上报告共捕蝗九百余万石[注7]，蝗害也就渐得止息。但对于蝗灾大发生时是否要进行扑杀的争论到此并未止息，而一直延续到宋朝，这也是法家“制天命”和儒家“畏天命”两种思想斗争延续的表现。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变，原来时发时息的蝗灾有愈来愈重的趋势；加之，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对于防除蝗害的要求也就愈来愈迫切；所以主张扑杀蝗虫以减轻农业上损失的人便愈来愈多。这说明法家的主张在当时愈来愈得人心，而儒家的骗人邪说已逐渐为大多数人民所抛弃；这也就是法家的“制天命”思想在与儒家的“畏天命”思想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的表现。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等都主张捕蝗，曾先后制定了捕蝗法令、奖励办法，并差人巡视督促。清代对于治蝗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治蝗的历史说明，对蝗灾进行积极的斗争，就能减轻蝗虫对农业的为害，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制天命”而生，“畏天命”而亡。儒法两家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斗争，就是我国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根除蝗害

法家尽管在历史上有它的进步作用，对治蝗也有其积极的贡献，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可能真正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治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劳动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把孳生蝗虫的荒洼草泊变成稳产高产的鱼米之乡，蝗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广大人民群众在治蝗斗争中创造的无数经验与取得的许多成就，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伟大的教导：**“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解放初期，1951—1952 年全国蝗虫发生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发生范围波及到 8 个省(市)、区；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把治蝗列为当时农业生产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向蝗区提供了大量治蝗药械、飞机和其他物质条件，各级党委领导群众及时扑灭蝗虫，保护了农业生产。同时，在蝗区广泛建立了蝗虫防治站，训练了治蝗专业人员，他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了预测预报工作，及时掌握了蝗情。随着治蝗经验的积累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在进一步掌握蝗虫发生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灭蝗技术，逐步控制了蝗虫的大发生。

群众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依靠药剂治蝗只能临时控制蝗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蝗害问题；要彻底消灭蝗害还必须治标与治本兼施，改造适合蝗虫孳生的荒滩湖洼。新中国成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后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和“**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这三条河流所经地区，也是我国的主要蝗虫发生地。兴修水利和

[注7]　见(唐)郑棨撰《传信记》。

改造这些低产农田环境是根除蝗害的基础。毛主席的号召鼓舞着这些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迅速展开了治水和改造农田环境的战斗。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蝗区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依靠群众，勤俭治蝗，改治并举，根除蝗害”方针的指引下，提出了改造蝗区和根治蝗虫发生基地的战斗口号。许多地区结合兴修水利，改造沿河滨湖内涝洼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开展植树造林，绿化环境，治蝗战线上出现了“改治并举”的大好形势。但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总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治蝗的工作中，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自力更生、勤俭治蝗，还是依赖国家、伸手向上要物质、要经费；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改治并举，积极开展综合防治，大打根除蝗害的人民战争，还是依靠少数人，单纯依赖化学农药。广大贫下中农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使治蝗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地批判了他们散布的“天命论”、“上智下愚”等孔孟之道，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广大蝗区的贫下中农心明眼亮，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的干劲，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制订并实现了以治水改田为中心的综合发展农业的规划：变水害为水利，变荒地为农田，变低产为高产，贯彻执行了改造蝗虫发生基地和药剂治蝗相结合的改治并举、根除蝗害的方针。现在有不少老蝗区如微山湖、洪泽湖、七里海、黄泛区和鲁豫交界的七十二大洼等已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使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蚂蚱窝变成了粮棉基地或鱼米之乡。解放二十多年来人民治蝗的实践，为我国治蝗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除自然灾害并为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研究治蝗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以历史为借鉴，联系现实的科学技术工作，我们深切感到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教导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因此，今天我们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肃清儒家反动思想的流毒，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使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更迅速地向前发展。